

严复诗文选注

江苏人民出版社

## 严复诗文选注

南京大学历史系《严复诗文选注》注释组  
国营红卫机械厂

\*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5年6月第1版

1975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11100·011 每册0.50元

## 前 言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在这场伟大斗争中，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科学总结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深入批判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深入批判宣扬复辟、倒退、卖国的孔孟之道，进一步加强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推动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发展。在这样一派大好形势下，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的教导，选注了严复的部分诗文。

中国近代的历史。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统治者相勾结，变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是中华民族英雄儿女不屈不挠，奋起反抗，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英勇斗争的历史。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

帝国主义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侵略战争，妄图吞并和瓜分中国。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顽固坚持尊孔卖国的儒家路线：对外屈膝投降，甘当帝国主义的走狗；对内残酷镇压人民群众，疯狂宣扬孔孟之道。但是，帝国主义的洋枪洋炮，封建统治者的枷锁屠刀，孔孟之徒的反动说教，决不能扑灭人民群众的反抗烈火。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和后来多次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反动统治，也猛烈地冲击了反动腐朽的孔孟之道和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在这斗争过程中，许多先进的中国人，面对国家重重灾难，满怀救国的热忱，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论人民民主专政》）

严复（1853—1921年），字又陵，号几道。福建侯官县（今福州市郊区）人。他在青少年时代，曾考入福州船政学堂，后又保送到英国海军学校学习。在那里，他亲身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研究了西方资产阶级学说。他抱着救国和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返回了祖国。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刚诞生不久。这个新兴的阶级，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为了摆脱这种压迫，求得国家的独立和

民主,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它迫切要求进行政治变革;但是,它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极端害怕群众,这就决定了它们的斗争不可能是彻底的。因此,它开始跨上政治舞台时,只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以求得资本主义的逐渐发展。它们手中没有什么象样的思想武器,因而严复首先从西方学来的机械唯物论、庸俗进化论和天赋人权的学说,便成了中国资产阶级向反动势力作斗争的主要思想武器。

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当时,举国激愤,万民沸腾,资产阶级就乘机发动了一个改良主义的变法维新运动,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便充任了这个运动的号手。他从1895年2月起,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战斗论文,并努力译述西方资产阶级的著作,为变法维新制造舆论。他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抨击封建统治者的顽固守旧,批判儒家学说的“无实”、“无用”,主张废除科举八股,提倡新学,鼓吹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在社会上起了很大的影响。如他写的《辟韩》一文,蔑视儒家奉为神明的“圣人”,鄙弃儒家视为至宝的“道统”,指出历代皇帝都是“窃国大盗”,给腐朽没落的封建专制制度以猛烈的一击。他首先译成的赫胥黎《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的学说警醒了国人。他在这部书中所发挥的

“天道变化，不主故常”、“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物各争存，宜者自立”、“保群进化，与天争胜”等论点都是和儒家学说相对立的。这对当时的中国人起了开拓眼界、震新耳目的作用。

反动腐朽的清朝统治者，不仅极端仇视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就连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要求也视为洪水猛兽。变法维新的呼声一起，便受到顽固派、洋务派的同声咒骂。他们把维新派人士说成是“名教罪人，士林败类”。他们指责维新派的宣传是“邪说暴行，横流天下”。他们攻击严复是“溺于异学，蔑古拂经”。他们用反动的孔孟之道向维新派实行猖狂反扑，叫嚷：“圣人之学，百世不迨”；“君臣之义，与天无极”；“祖宗遗训，岂容轻改”。

面对反动派的疯狂叫嚣，维新派人士采取的态度各有不同。许多维新人士虽然也不满反动的儒学，但被孔老二这个庞然大物所吓倒，不敢公开反对“周孔之教”。象康有为，还给孔老二穿上一套变法的时装，尊为维新的祖师。而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却以尊法反儒的鲜明态度，以应孔孟之徒的挑战。

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致康·施米特》

1890年10月27日)严复向反动派作斗争的思想武器,除了西学以外,并吸取了中国历史上的法家思想。他看出儒法两家历来是两个不同的学派,代表着不同的政治主张。因此,他认为“居今而言救亡,学惟申韩庶几可用”,公开表明自己是尊崇法家的。他热情赞扬商鞅“更井田而废阡陌,废封建而置郡县”的变法措施。他高度评价荀况的“人定胜天”思想。他称颂秦始皇为古之“豪杰”,认为“销兵焚书”是当时实现“大一统”的需要。他赞扬王安石是“千古相臣”,王安石的变法是“千古之大虑,不容后人轻易排击也”。他还把西方的“富强之道”与中国的“申韩之术”相提并论,把当时资产阶级的变法维新运动看作是商鞅以来变法事业的继续。对于反动的儒学,他从各个方面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儒家的“政教”“少是而多非”,儒家的“六经”“且有不可用者”。他认为“周孔之教”只能用来“聊以自娱”,于国家政事毫无补益。他认为,儒家吹捧的孔丘,“乃假设之平圣人,而非当时之真孔子”,号召人们“何必学孔子”。他对历史上的一些儒家代表人物,如董仲舒、韩愈、朱熹、王守仁等,都进行了批判。特别是他从当时变法维新、救亡图强的要求出发,对清王朝顽固推行的反动的儒家路线,大力的进行了揭露和斗争。这种斗争主要表现为爱国与卖国之争、变法与守旧之争、新学

与旧学之争。

在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是维护主权，进行抵抗；还是忍辱退让，屈膝投降？这是当时斗争的首要问题。反动腐朽的清朝政府，推行了一条投降卖国路线。他们被洋枪洋炮吓破了胆，认为对帝国主义“可亲而不可侮”。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又一次蒙受了奇耻大辱。而以那拉氏为首的封建顽固派和以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却弹起“礼之用，和为贵”的儒家滥调，无耻扬言：“宁赠友邦，勿与家奴。”对于清政府的这种卖国投降路线，严复从各方面给予揭露和批判。他提出“身贵自由，国贵自主”，认为一个国家必须保持自己的主权，维护自己的独立；如果一旦丧失独立，“其生也不如死，其存也不如亡”。他强调对外国侵略者必须“强立不反，出与力争”，认为只有奋起抵抗，坚决斗争，才能“磨厉玉成，有以自立”。因而呼吁全国“同力合志，联一气而御外仇”。他指出当时中国的首要问题是“慎守力权，勿任旁夺”，就是说要谨慎地保卫自己的主权，不要让帝国主义所侵夺。他坚决反对向帝国主义屈膝求和，认为“和之一言，其貽误天下，可谓罄竹难书”。严复在这一时期所发表的许多文章中，充满着爱国的激情。他一面分析了“四邻眈眈”的危急局势，指出了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的阴



谋，揭露了封建制度的腐朽衰败和清朝统治者的卖国主义嘴脸，认为这样下去，就有“亡国灭种”的危险。一面呼吁“吾奋吾力”、“合群图强”，号召“以人持天”、“与天争胜”，认为只要坚持斗争，奋发图强，象中国这样积弱积贫的国家，也一定能够改变面貌，置身于富强之列。他强调“天下事正于此而大可为”，并预言几十年以后中国必将以富强著称于世。这些思想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敢于斗争，决心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革命精神。

面对反动腐朽的封建统治，是变法维新，以求进步；还是顽固守旧，坚持倒退？这是当时斗争的又一个根本问题。顽固派和洋务派为了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大肆宣扬儒家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反动观点，死抱着“祖宗成宪”不放，甚至叫嚣“宁可亡国，不可变法”。严复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变革要求，批驳了这种保守、倒退、卖国的论调，为变法维新大造舆论。他分析了当时国内外的情况指出，自秦朝以来中国社会又到了一个急剧变革的时期，这种变革是历史的潮流，任何人无法阻挡。他把中国社会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作了对比，认为中国积弊已深，“不变法则必亡”；大声疾呼：“早一日变计，早一日转机，若尚因循，行将无及。”他指出事物的进化是一种客观规律，从自然界

到人类社会，都在不断变化，世间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东西，“不变一言，决非天运”。他认为人类社会和生物界一样，都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且演且进，来者方将”，因而反对“厚古薄今”。他用“力今以胜古”批判了儒家的“好古而忽今”。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政体法制，应当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决不能“以千百年前之章程，范围百世下之世变”。他认为国家是人民的“公产”，并以资本主义国家设议院、选总统的事实，批驳儒家的“君权神授”，反对封建统治者“以一二人之意见，强齐亿兆辈之性情”。他主张在中国废除封建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这都说明严复的变法维新，就是要变地主阶级之法，维资产阶级之新。他大力揭露中国封建社会的种种弊害，反复宣扬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富强之术”。他提出了“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口号，并用“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作为他鼓吹变法的纲领。

对以儒学为代表的封建阶级的旧文化，是进行革除，弃旧建新；还是竭力保护，不许触动？这是当时斗争的又一个重要问题。这个斗争是政治斗争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反映，具体表现为西学与中学、新学与旧学、学校与科举之争。资产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要求，就必然要提倡资本主义的新文化，抓意识形态方

面的工作。而封建阶级为了保持其反动统治，也必然要维护为封建制度经济基础服务的旧文化，企图扼杀一切新文化的诞生。当时的封建顽固派根本反对西学，“恶西学如仇”；洋务派则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同样以孔孟之道为根本。他们都竭力提倡尊孔读经，竭力维护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严复对此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指出统治阶级所提倡的“中学”，是败坏民力、民智、民德的祸根，如果不加革除，就会造成民弱国贫，不能与西方国家“争一旦之命”。他指出儒家的汉学、宋学和词章之学不但“无实”、“无用”，而且“谬种流传，羌无一是”，“其为祸也，始于学术，终于国家”。他认为洋务派标榜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盗西法之虚声，沿中土之积弊”，完全是骗人的东西。他痛斥八股科举制度有“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三大祸害，认为这是统治阶级“牢笼天下，平争混乱之术”。他嘲笑科举制度下培养出来的儒生，是一批“以钱财为上帝，以子孙为灵魂”，一心想的是功名利禄，而置国家安危于不顾的“道学先生”。因此他指出，变法的当务之急是废除八股，兴办学校，革除旧学，提倡新学，“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在**当时，这种所谓新学的思想，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

以上三个方面的论战，实质上反映了当时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严复在这场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表现了一个勇猛战士的姿态。他敢于向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周孔之教”投以轻蔑；他敢于对地主阶级的“祖宗之法”发出叛逆的呼声；他敢于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联盟提出挑战；他敢于对长期以来居于正统地位的反动儒学发动进攻。这些都表现了他的尊法反儒的勇猛战斗精神。

阶级斗争的历史表明，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社会制度，代表新制度的先进阶级，必须通过革命推翻维护旧制度的反动阶级，并运用政权的力量对反动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才能实现。中国资产阶级的变法维新，只是一个改良主义的运动。它既阻挡不住帝国主义的侵略狂潮，也动摇不了清政府的反动统治。而当一些变法措施开始实际推行的时候，就遭到了血腥的镇压。戊戌变法的失败，宣告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路线的彻底破产，它惊醒和教育了更多的人走上武装斗争的革命道路。但是，那些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头头并没有从中得出应有的教训，仍然坚持改良主义立场，成了革命的绊脚石。严复也是如此。他既慑于反动派的刀光剑影，又害怕人民革命运动的电掣雷鸣。因此，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和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他的战斗生涯也宣告

结束。此后，他“屏弃万缘”，埋头于翻译西方资产阶级的一些著作。偶而对黑暗的现实也发出不满的呼声，但这种呼声显得那样的软弱，那样的无力。既失去当年的锋芒，也就得不到社会的响应。这一时期他翻译的一些西方著作，虽然在传播资产阶级科学文化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已没有他译述的《天演论》那样的影响了。及至辛亥革命以后，严复作为一个时代的落伍者，竟在政治上赞同复辟帝制，思想上转向尊孔读经，把自己完全置于人民革命运动的对立面。他的这种转变当然有其阶级和历史的必然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带有两重性的阶级。严复所代表的则是这个阶级的上层，他们政治上更加软弱，斗争中有更大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这种特性，严复在维新运动时期已暴露得很明显，他虽然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宣扬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但不敢提出实行共和，仅仅要求君主立宪。他反对旧学，提倡新学，但在他的新学思想中往往又夹杂了许多封建毒素。他主张进化，要求变革，但又以“其时未至，其俗未成”为借口，反对革命，鼓吹改良。他虽然从西方搬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等思想武器，但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

**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新民主主义论》）。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严复的战斗经历，向我们又一次证明：历史上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各个时期虽然有不同的阶级基础和政治内容，但是，前进与倒退、革新与守旧、爱国与卖国却一直是斗争的焦点。一切腐朽没落的反动势力，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总是求助于孔孟之道。一切进步的阶级和人士，为了实现其理想和抱负，就必须与反动的儒家路线进行斗争。而这种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从来没有调和的余地。历史上许多进步的思想家，当他们顺应历史的潮流，举起尊法反儒的旗帜，向孔孟之道和它所代表的反动势力冲锋陷阵时，总是得到人民的拥护，起了不同程度的进步作用；而当他们一旦停步不前背离了正确路线，就必然导致理论上实践上的错误，甚至被拉到敌人营垒中去。严复是一个资产阶级思想家，他不可能把批判孔孟之道的斗争进行到底，他所设想的种种方案也根本不可能挽救中国的危亡。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彻底批判孔孟之道，涤荡旧社会的一切污泥浊水，并永葆其美妙之青春。

毛主席教导我们：“**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

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改造我们的学习》）无产阶级要从现实斗争中总结经验，同时对历史上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也要给以科学的总结，以作为指导现实斗争的借鉴。在中国近代史上，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错综复杂的。读一点严复的著作，分析一下他的尊法反儒、反帝爱国、变法图强的思想，总结一下近代史上儒法两条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将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认识，有助于增强我们反对帝、修、反的革命斗志，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批林批孔运动必要性的认识，有助于深入批判孔孟之道和林彪的卖国投敌、复辟倒退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从而提高我们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为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自觉性。

由于我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不高，注释中难免有许多缺点和错误，希望广大工农兵和专业工作者提出批评指正。

# 目 录

论世变之亟	1
原强	17
附：《直报》刊载的《原强》	72
辟韩	88
原强续篇	102
救亡决论	116
译《天演论》自序	166
论沪上创兴女学堂事	176
论中国教化之退	185
有如三保	191
道学外传	203
《天演论》按语选	210
《原富》按语选	217
《穆勒名学》按语选	234
《法意》按语选	239



戊戌八月感事 .....	252
和荆公 .....	254
和荆公《适意》 .....	256
和荆公《“悯”儒坑》 .....	258
和荆公《贾生》 .....	260